

重返历史“原点”的旅程

◎ 梁钺皓

摘要：《重返文学的“历史现场”》是吴秀明回顾几十年学术生涯的一部论文自选集。它以“历史”作为关键词，通过从“文本内部的历史”向“文本外部的历史”的转换，在重返历史“原点”的旅程和文史互动的探索中，实践了对“学术根据地”的建立与超越。同时，也触碰到了当代文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基础与本真所在，为现实及未来当代文学研究如何“历史化”提供了启迪。

关键词：当代文学 学术根据地 重返“原点” 文史互动

吴秀明教授近期出版的学术论文自选集《重返文学的“历史现场”》，用时间倒叙的编排方式回顾了其几十年的学术生涯。尽管该书三编即三个部分，都以“历史”作为核心关键词，但在实际上，第一、二部分与第三部分之间存在着一个较大的学术转折，这就是从“文本内部的历史”转向“文本外部的历史”。

“文本内部的历史”更多还是聚焦于文学文本本身。在这方面，历史小说是具有相当代表性的。某种意义上，历史小说中的“历史”，不妨可看作是一个“容器”，作为文本内部的一个时间概念，它更多指向的是当下。历史小说所谓的“旧瓶装新酒”的说法，大概与此相似。而“文本外部的历史”，就不是一个“容器”可比拟，它更多的是作为具体切实的一个文学“周边”存在。无论是文学史的书写，还是文献史料的运用，它都与文学“周边”有这样或那样的关联。也就是说，前者仍旧是以文学文本为核心的批评式的研究，后者则是将“文学”与“历史”并置在一起，试图寻求两者的平衡与互通的研究。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我更愿意将吴秀明对历史小说的研究，看作是他学术发展的一个奇妙的早期预言，冥冥之中指向其日后对于文学史和文献史料的研究。“学术根据地”在文史之间的真正建立，或许是从文学史构建开始，后来再向文献史做了进一步的延伸和拓展。

在另一个层面上，吴秀明所致力文学史编写和文献史料研究，这一研究涉及的不仅仅是当代文学作为文学本身的问题，而且也涉及当代文学作为一种学科的存在问题。当代文学与古代文学、现代文学不同，它是“现在进行时”的文学。“现在进行时”就意味着，作为研究者的学者与作为创作者的作家身处于同一个时空中，他们不可避免地要进行对话。如此这般，就使得当代文学的研究更多是以“批评”的方式存在。无论是“文革”前的17年，还是新时期以来的这40年，批评的话语都是当代文学研究的主要发声方式。尽管这种方式对当代文学创作和发展至关重要，但过多泛滥也容易使其滑向平面和简单。如果说17年这种批评式发声是因为当代文学及其批评本身就处在“一体化”中，那么在新时期以后不断涌现的文学思潮和不断输入的西方理论，客观上也注定了当代文学研究的浮

夸和漂泊状态。因为一旦它们成为学者应接不暇的现实语境,那么作为基础的学科建设受到冷落自然也难可以理解。

正是在这样的层面上,如何使当代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存在就成为许多学者关注和思索的问题,吴秀明也是这些学者中的一员。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他不仅在《面对“丘陵”的忧思——关于当代文学学科的几点思考》《学科视域下的当代文学史料及其基本形态》这些直接面对作为学科的当代文学的文章中,而且在诸多的譬如《一场迟到了的“学术再发动”——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的意义、特点与问题》《探寻立体呈现当代文学史料的体系与方式——〈中国当代文学史料问题研究〉的编纂理念与学术追求》《批评与史料如何互动》等关注点并不在学科建设上的文章中,反复不断地强调当代文学的“学科建设”,将这个问题提得如此重要和急迫。

“历史”是吴秀明提出的当代文学通向知识化及其推进“学科建设”的一条重要路径,也说明他所追求的“学术根据地”正是落在文学与历史的互动基础之上的。这种对于文学与历史互动的追求,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层面。

第一,文学史的书写。文学史本身就是一个兼具文学与历史双重定义的学术活动,诚如吴秀明在《当代文学学科特点与时代新质的嬗变——兼谈当代文学史编写的另一种思路》一文中所说:“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文学史与文学批评及一般的文学研究还是有区别的:前者既属于文艺科学,又属于历史科学,它兼有文艺学与历史学两方面的性质和特征;而后者则基本归属纯文艺科学的范畴,更具个人主观化的色彩。”^①当代文学是近距离的文学,与研究对象的贴近,虽然可以为研究提供许多文献史料的便利,但同时也往往带来过于主观化与经验化的弊端。同时,当代文学的诞生与发展并非是一个纯文学自由成长的过程。17年的意识形态,不仅左右着创作的运行形态,而且也深刻地影响着文学批评。新时期以降,尽管我们对17年创作与批评进行了反思,但那只不过是启蒙话语代替革命话语。新时期启蒙话语直接来自“五四”。这种现代化焦虑所产生的话语机制,使之难以超离原有话语机制的运行规律。它与革命话语一样,都直指“五四”,并殊途同归。当学科的更变成为了一种话语的更迭时,当代文学也就很难像古代文学、现代文学那样拥有可靠的学科基础。除此之外,我们还要看到,20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商业社会的迅速到来,击溃了当代学者扮演的导师角色,被边缘化带来的溃败和焦虑随之浸渗到当代文学领域。这种溃败和焦虑在“人文精神大讨论”中曾集中爆发过一次,但现如今它也只成为一次失落的历史记忆。

从根本上说,当代文学创作与研究,始终还是理念为先,文学随后。这也是吴秀明在诸多文章中经常提及的“以论代史”“以论带史”的弊端由来。陈思和曾说:“我们把‘五四’现代文学的分类作为标准,作为文学史的制高点,像灯塔一样。往前看晚清,往后看整个20世纪,所有与‘五四’有关的,都被抬高和尊崇,都是有意义的,比如黄遵宪的‘诗界革命’,比如梁启超的‘新小说’,还有翻译小说,翻译剧本,等等;而与‘五四’无关的都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在这个灯塔的照射下,很多与之无关的东西都被推到了暗影中,没有得到应有的认识。”^②陈思和此说,正是吴秀明提出的当代文学“历史化”所要面对与解决的问题。所以他强调文学史编写需要做到尽量地客观与公正,而不是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对之作居

高临下的批判。在20世纪“重写到文学史”这个声势浩大的文学事件中,个人的文学审美体验开始在文学史编写中被要求。不过我们应该认识到,我们的文学史的编写未必不是一种社会政治的预设景观。张爱玲曾说:“生活的戏剧化是不健康的。像我们这样生长在都市文化中的人,总是先看见海的图片,后看见海;先读到爱情小说,后知道爱;我们对于生活的体验往往是第二轮的,借助于人为的戏剧,因此在生活与生活的戏剧化之间很难划界。”^③这也说明文学史编写的艰难不易。尽管我们始终在避免一种关于文学的单一阐释与讲述,但我们的确总是摆脱不了阐述遮蔽事实的困境。

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吴秀明在文章中说:“我们强调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追求和实践的就是这样一种开放的文学史观,目的是为了最大限度地还原文学在一体化机制中的自行演出及遭遇的生存状态,真切地感受文本的丰富繁复的形态,从而体会到历史的存在空间与文学的符号空间的‘不对等性’。”^④他将文学史的一个重要的作用放置于还原上,这从某种程度上正可以避免一种“理念先行”的研究倾向,也在最大程度上将文学史从预设景观的困境里解放出来。吴秀明不仅在理论中这样阐释,并且在具体的文学史编写实践中也努力地实行这一点。由他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写真》,就尽可能地多描述、少判断,他希望“通过尽可能全面翔实史料的展示,还原多元共生、丰富复杂的当代文学本真状态,靠史实说话。”^⑤这部体例独特的文学史,也是吴秀明坚守与超越自己“学术根据地”的另一个侧影。

第二,史料在文学研究中的运用。这也是吴秀明这本自选集的第一个部分。运用史料实则是关注到了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即是作为文学“周边”的当代文学。李洁非有言:“自特殊性言,当代文学史不是作家史,不是作品史,是事件史、现象史和问题史。”^⑥这一观点与吴秀明所推崇的史料研究不谋而合。作家王蒙于1988年化名“阴雨”而写的《文学:失却轰动效应以后》一文,实则也是在为文学“周边”的弱化作惋叹。谢冕主编的《百年中国文学总系》选择了十个年份讲述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实则就是将这种文学性之外包括事件在内的“周边”现象展现到了极致。

文学作为与“周边”事件有关的一种精神文化活动,它不可避免地会将文学推向更为广大也更为泛化的非文学,这种非文学往往被许多学者所厌弃。回到文学本体,回到文本,回到文学性的现场,俨然成了学界所高呼的口号。甚至有学者还提出:“一是不做史料研究,二是不做文学史研究,三是不做作家年谱和作品版本。认为这些都是历史研究和考古研究,与文学创作无关,与文学本身无关。”^⑦这显然体现出了研究者对于“纯文学”的诉求。这种诉求当然是合理的,但是否就是必须?这是可以讨论的,甚至不妨质疑。至少它与当代文学的真实存在有着颇大的距离。对于当代文学文本解读,在很大程度上是离不开文学“周边”事件考察的。17年文学不必赘言,作家作品命运与诸多的政治事件紧密相连。即便是新时期以后,不断涌现的文学流派实质上也是一次又一次的文学事件。更加显著的还有“人文精神大讨论”之于王朔,“断裂”问卷之于第三代诗人与90年代个人化写作,“马桥诉讼”之于韩少功,文学事件是造成对文本的误解也罢,是理解作家文本的途径也罢,至少都是回归文学文本的方式之一。纯文学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还原文学的本来面貌,这是一个十分暧昧的命题,至少在我看来它是一个伪命题。而通过文学事件,也

就是通过“历史”或“周边”去回溯文本,则是一种有实感的阐述途径。正是如此,吴秀明才如此强调“重返历史现场”。史料作为一种还原性的研究工具,诚如吴秀明此书的书名,是重返文学的“历史现场”的关键所在。唯有重返了文学的“历史现场”才有可能洞察当代文学的运行机制,并为后来的文学创作留下一面可以参照的镜子。

重返意味着还原,吴秀明在文章中讲到:“这也提醒我们,在搜集、整理和研究当代文学运动史料时有必要超越二元对立的思路,既要注意每个个体作为批判者留下的史料(在当下,这种史料往往被人们刻意回避),同时也要注意每个个体作为被批判者留下的史料(在当下,这种史料往往被人们有意强化),尽可能全面地占有史料,而不是以偏概全,不加辨析地听信和使用那些有选择的所谓的‘回忆录’。”^⑧这也是我们反复提及吴秀明“学术根据地”建立起的土壤所在,即文史的良性互动。“文”当然是文学研究的核心所在,但“史”却是通向文本真实的一条可靠路径。它的终极指向或许正是我们所不断追求的“真善美”中的真。那些文本以外的血泪与欢笑,辛酸与嘲弄,意气与无奈,同样应该是我们寻求的真实。

还要值得一提的是,吴秀明对史料的分类。他不仅将视野投向离我们已有些年月的17年史料搜集上(他对彼时牵涉政治的史料的搜集困难亦有阐述),而且将目光投向了具有“当代形态”的史料上。其中尤为突出的便是网络文献史料,我们的学术研究有着很大的“远视症”,往往顾得了过去,却遗忘了当下。吴秀明在文章中就提到发生在2006年的“韩白之争”,在结束后,韩寒删去了博客中的所有相关文字。面对这些史料,我们应该如何去收集、保存与研究?吴秀明立足自己的“学术根据地”,对此作出了自己解读。

通过史料重返历史“原点”,回归文学的“历史现场”,是吴秀明学术追求的核心所在。他以三个不同阶段的学术生涯的变迁,在构建自己“学术根据地”过程中不断地进行自我超越。我以为文学的本真或许至今无人可以触及,但吴秀明作为学者,的确是触碰到了当代文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基础与本真所在。当代文学将何去何从,这是一个无从解答的问题,不过当代文学从何而来,本貌何如,吴秀明已经给出了一个值得继续行走下去的方向。

注释:

①⑤ 吴秀明:《当代文学学科特点与时代新质的嬗变——兼谈当代文学史编写的另一种思路》,《浙江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

② 陈思和:《“五四”文学:在先锋性与大众化之间》,《中华读书报》2006年3月8日。

③ 张爱玲:《童言无忌》,见《流言》,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98页。

④ 吴秀明:《当代文学独特的时间顺序与空间结构——兼谈当代文学史的时空关系处理》,《清华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

⑥ 李洁非:《典型文案》,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页。

⑦ 晏杰雄:《批评写作的行话与师承》,《文艺报》2016年11月25日。

⑧ 吴秀明:《“一体化”视域下的当代文学运动史料》,《南方文坛》2017年第6期。

(梁钺皓,男,浙江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